

Stefan Zweig

Beware of Pity

心灵的焦灼

茨威格生前惟一的长篇小说

〔奥〕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华艺出版社



90111832

Stefan Zweig

Beware of Pity

心灵的焦灼

茨威格生前惟一的长篇小说

[奥]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的焦灼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 张玉书译.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4.5
(茨威格作品集)
ISBN 7-80142-568-5

I. 心… II. ①茨…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109 号

书 名:	心灵的焦灼
作 者:	(奥) 茨威格
译 者:	张玉书
责任编辑:	罗 晓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电 话:	010-82885151
社 址: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83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印刷装订: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字 数:	320,000
印 张:	10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568-5/I · 243
定 价:	2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斯台芬·茨威格： 一位大师的画像

斯台芬·茨威格
1881-1942

一九二三年八月六日，高尔基给罗曼·罗兰的信里写道：“斯台芬·茨威格——一本关于您的书的作者，是否也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作者？如果是这样，请向他转达我对这个出色短篇的由衷赞赏。这篇东西好极了，它深深地激动了我。我向柏林的一个俄罗斯出版家建议，把它收进他出版的《爱情》丛书里。这套丛书印刷讲究，插图精美，其中包括《曼侬·莱斯戈》，屠格涅夫的《初恋》、《我们的心》，哈姆生的《维多利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您的《皮埃尔和吕丝》，此外，还有许多种。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收进这套丛书，他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吧！”同年八月二十八日，罗曼·罗兰回信给高尔基：“斯台芬·茨威格——就是您提到的出色短篇的作者，您的要求我将转告，他会感到十分高兴。”

这位受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热烈称赞的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早在二十年代，《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已经译成中文，根据这篇小说拍摄的美国电影《巫山云》，在四十年代便已介绍到中国。茨威格自己也知道他的作品已经译成中文，他在自传《昨日的世界》里回忆他五十岁生日时这样写道：“海岛出版社为了庆祝我五十岁寿辰，特地印了一份用各种文字发表的我的著作的书目汇编，它本身就成了一本书，各种文字应有尽有。既有保加利亚文，也有芬兰文，既有葡萄牙文，也有亚美尼亚文；既有中文，也

有摩诃刺陀文。”^①

这是一九三一年。

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茨威格小说的中文译文流传不广，到四五十年代甚至完全绝版。五十年代可能把他误认为颓废作家，无人敢于问津。一九五七年九月，《世界文学》发表了茨威格的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茨威格心理分析的深刻，人物刻画的细致，语言的流畅优美，情节的扣人心弦，引起许多读者击节赞叹，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对于德语文学拥有这样出色的珍品欢欣鼓舞；然而也有人觉得小说情调有些颓废，内容不甚健康，缺乏教育意义，颇有毒草之嫌，于是视为异端，结果《世界文学》发表的那个中篇终成绝唱。

其实，这种武断的结论之所以产生，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对这位作家介绍不多，研究不够，如果认真考察一下作者走过的生活道路和从事的创作实践，大约不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师其人

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关于这一点，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和爱克曼谈话时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他们谈到一个年轻的法国文学家约翰·雅克·昂贝尔。此人二十多岁便崭露头角，颇有成就。歌德说道：“请设想一下巴黎这样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各个领域里的精华都成天在那里供人公开观赏；请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城：……一百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传播在巴黎城里，在世界上简直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这样一想您就会明白，像昂贝尔这样的人才，在这样充满聪明智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二十四岁的年纪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十九世纪初的巴黎相似。一八〇六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奥国兵败，奥地利退出了和普鲁士角逐德意志各邦盟主的斗争，国力衰微了。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维也纳

①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1862—1931), 奥地利著名作家、戏剧家。

② 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 (1874—1929), 奥地利诗人。

斯台芬·茨威格

1881-1942

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 虽然没有像巴黎那样成为全欧瞩目的政治经济中心, 但因皇室和上层人士热心扶植文艺, 逐渐成为对欧洲各国文艺界人士最具吸引力的艺都。几十年中, 贝多芬、莫扎特、约翰·施特劳斯父子、李斯特、萧邦在这里生活和活动, 群英荟萃, 人才云集, 使维也纳成为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斯台芬·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父亲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 母亲出身于金融世家, 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奥地利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 恰好最热心文化艺术。这对茨威格的成长是极为有利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维也纳涌现出以阿尔图尔·施尼茨勒^①为首的一代才气横溢、成就卓越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奥地利文坛出现一片繁荣景象, 犹如繁茂的花圃百花盛开, 争奇斗艳。被誉为“神童”的天才诗人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②, 在十六岁上便一举成名。他的出现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 影响了并且鼓舞了一代青少年。还在念中学的茨威格把比他只大七岁的霍夫曼斯塔尔看做学习的榜样。十六岁那年, 他就在维也纳著名的《社会》杂志上发表了最早的诗歌, 博得一致好评。从此, 年轻的茨威格便踏上了通向大师行列的道路。

文坛的繁荣并不是孤立现象, 它和学术上的活跃是孪生姐妹。值得一提的是,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和尼采的哲学也在这时应运而生, 对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中学时代, 茨威格就阅读弗洛伊德和尼采的作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茨威格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尼采是个十分复杂、极有争议的哲学家。其哲学中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内容, 影响都很大。茨威格认为, 尼采在哲学方面进行了一场革命, 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尼采哲学开拓了茨威格的眼界, 使他对这个社会认识得更深刻, 透过道貌岸然、金碧辉煌的表面看到肮脏污秽、腐朽没落的实质。我们在茨威格的小说里所看到的深刻的社会批判便是明证。

一八九九年, 茨威格中学毕业, 上维也纳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一九〇〇年他到柏林学习了一个学期, 然后回到维也纳继续学习, 一九〇三年取得博士学位。大学期间, 他勤奋研究外国文学, 接触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并且开始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兰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诗歌。在柏林学习时, 他有意地深入到社会底层, 和一些被唾弃的社会渣滓交往, 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 对这些畸零人产生了

深切的同情。他利用假期出国访问。大学毕业后，他更加有意识地游历各国，和各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在比利时，他拜访他的忘年交，著名诗人，“青年比利时”派的领袖维尔哈伦；在法国拜访杰出的雕刻家罗丹，结识了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见到了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丹麦文艺评论家勃兰兑斯。和这些名流的交往使茨威格眼界大开，既领略到欧洲文学艺术的最高水平，同时也使他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因此，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很多著名作家、诗人都卷入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惟有少数卓越的人士能够头脑清醒、目光犀利地看透沙文主义的本质，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形说：“当时民众还不假思索地信赖权威，在奥地利，谁也不敢产生这样的念头，说受到万众尊敬的国父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凭他八十四岁的高龄，并不是万不得已，居然会号召人民起来作战，不是在邪恶凶险、罪恶多端的敌人威胁帝国和平的情况下，居然会要求民众流血牺牲。”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对国君的迷信，确实是广大百姓上当受骗的原因。不久，战争狂热席卷交战各国。“忠诚老实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这样的纸条：‘愿上帝惩罚英国’，或者打上这样的邮戳。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且写信给报纸），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剧院，莫扎特和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宣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群人不染上这种仇恨的可怕的歇斯底里。”

茨威格之所以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并不是因为他对这次战争的性质比别人认识得清楚，而是因为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奥地利宣战前夕，他正好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作客。他不能相信，他那些生活在边界另一边的朋友一夜之间会变成仇敌。当各国民众争先恐后地表示自己如何忠于自己祖国时，茨威格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写了一篇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他忠于一切在外国的朋友。尽管现在相互之间不可能建立联系，但只要有机会，他要重新和他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他把这一稿件寄给当时读者最多的《柏林日报》。使他意外的是，该报把这篇文章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全文发表（只删去一句话：“不论胜利落在谁的头上”，因为它有失败主义之

① 盖哈特·豪普特曼 (1862—1946)，德国著名的自然主义戏剧家。② 托马斯·曼 (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理查·德默尔 (1863—1920)，德国诗人、作家。

斯台芬·茨威格

1881-1942

嫌)。两周之后，茨威格收到罗曼·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感情真挚，意义深远：“Non, je ne quitterai jamais mes amis!”（法文：不，我永远也不离开我的朋友们！）当时罗曼·罗兰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茨威格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的文章里向他公开表示感谢，感谢他为人道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茨威格的这一行动不仅为他赢得了罗曼·罗兰至死不渝的友谊和人们的普遍赞扬，同时也表明他绝不是一个钻在象牙塔里为艺术而艺术，为心理分析而进行心理分析的作家。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战士，但是他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那敏感的心知道战争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无边的痛苦。大战爆发后，罗曼·罗兰倡议在瑞士召开一个大会，请各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以便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促进了解、加强团结的号召。茨威格负责争取德、奥两国的作家。当时德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豪普特曼^①拒绝参加。托马斯·曼和德默尔^②还未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霍夫曼斯塔尔和瓦色曼也不能指望。“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还太早，战争对于后方的人来说还相隔太远，我们是孤零零的。”茨威格后来这样喟然长叹。

战争爆发后，茨威格因体格检查不合格，免服兵役，在军事档案馆任职，职务是管理图书馆。一九一五年，茨威格奉上级命令到波兰前线去收集俄国方面贴出的公告、布告的原文。他亲眼看见奥军占领地区百姓们遭受的痛苦和灾难，发现奥军和俄军战俘之间并无敌对情绪，交战双方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百姓都把这场战争视为厄运。这些观感加深了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加强了他反战的决心。必须为反战而斗争！他认识到敌人是谁，“就是虚假的英雄主义，它宁可把别人送去受苦丧命，那些没有良心的预言家们——政治的和军事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毫无顾忌地预言胜利，延长屠杀，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来的那些合唱队。谁要是表示顾虑，就是扰乱了这些人的‘爱国主义’买卖；谁要是发出警告，这些人就嘲笑他是悲观分子；谁要是反对这场并不使这些人自己受罪的战争，这些人就攻击他是叛徒。”他选定这些预言家们以及他们所鼓吹的虚假的英雄主义和骗人的乐观主义作为他攻击的目标。他也选择了一个预言家作为他的反战剧本《耶利米》的主人公。这位《旧约全书》里的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灾难，可是无人听信。茨威格用这个剧本向那些陶醉在盲目的胜利喜悦之中的人们发出警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目的绝不是想写一部‘和平主义’的剧本，说些尽人皆知

的真理——和平比战争好,而是要表达一下众人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被人看做软弱分子、胆小鬼而受到轻视的人,在失败的时刻大多证明只有他们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能控制失败。”

茨威格当然不敢指望这出预言失败并且赞扬失败的戏能在德国、奥国的舞台上公演。这个剧本能够付印,已经是个奇迹。一九一七年复活节,《耶利米》出版,获得空前成功,作者深感意外。时间帮助了茨威格,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他的成功在于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憎恨,对胜利的怀疑。

不久,瑞士苏黎世市立剧院来信要求上演《耶利米》,并邀请作者参加该剧的首演。茨威格来到瑞士,首先到日内瓦去拜访罗曼·罗兰,然后再去苏黎世。他在那里不仅参加了该剧的首演,还和法国诗人儒弗^①一起举行联合朗诵会。茨威格朗读他的《耶利米》,儒弗朗诵自己的诗歌。他们用这样的行动表示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友谊,并无仇恨,民族仇杀是违背人民心愿的。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举动。茨威格留在瑞士,直到战争结束。

大战一结束,茨威格就返回奥地利。战争期间,茨威格在萨尔茨堡买了一所房子,是座年久失修的古老府邸,坐落在小山上。就在那里,他和人民一起经受了战后的饥饿寒冷和通货膨胀。冬天缺乏燃料,无法生火取暖,茨威格就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写作,写完一页便把冻得发紫的手指伸进被窝取暖。他看到很多人无家可归。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饥饿。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茨威格分担了普通百姓的痛苦,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对他们充满了爱。两次大战之间,茨威格亲身经历了战后通货膨胀和失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经历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纳粹分子的崛起,在和人民接触过程中,在多次出国旅行途中,他研究人的灵魂,研究人的内心世界,研究历史,以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事件中群众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活动。这就使他在这些年里写出了大批动人的小说和传记,把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广阔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用饱蘸同情的笔墨描写人们的不幸命运,刻画他们饱经忧患的灵魂,挖得深、写得细、写得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赢得了他们的爱。这位熟谙历史、洞悉灵魂的传记作家、小说家,在人们还没有看清法西斯的罪恶企图,还没有觉察法西斯的危机之前,早已预感到阴云密布、杀气冲天。可惜他性格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对此,他直言不讳:“我的天性

和英雄气概是格格不入的，我并不耻于公开承认这一缺陷。我在任何危险情况中的自然态度总是躲避。”这个弱点到紧要时刻，竟导致他悲剧式的结局。

大师其文

在上世纪末涌现出的这批维也纳大师当中，茨威格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著名诗人德默尔劝茨威格从事翻译。还在大学时代，茨威格便翻译了魏尔兰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一九〇二年，他到比利时访问著名诗人维尔哈伦之后，用两年时间集中全力翻译了维尔哈伦的诗。在翻译过程中，既锻炼了文字，也学习了写作。茨威格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翻译成为作家的。然而，单单翻译还不能造就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要接触现实。海涅说过：“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拉克勒斯举到空中，就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远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就变得软弱无比。”茨威格少年时代，曾经像他的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里的那对小姐妹那样，以天真无邪的眼睛观察过他周围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发现，这些家庭的家长因害怕子弟出外寻花问柳，挥霍家产，宁可纵容子弟和家里的女教师、使女纠缠，把这些可怜的姑娘变成纨绔子弟的玩物。在资产阶级标榜的这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善。上大学以后，他有意识地深入到社会底层，去认真研究现实生活。后来他又经常出门旅行，欧、亚、非、南、北美洲都印上了他的足迹，他甚至到过中国边界。在长途旅行中，他着重研究的还是人，人的命运，人的内心。他对那些被社会抛弃、被命运压扁的畸零人充满了同情，在他的作品里描写了这些人的命运。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被人误认为颓废派的作家。其实，何尝是作家故意丑化现实，现实本身就是丑恶、畸形的。不是文学故意要写伤痕，而是现实生活本身伤痕累累。日丹诺夫也曾粗暴地把现代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鼻祖恩·台·阿·霍夫曼^①打成僧侣主义、颓废主义。而海涅却认为霍夫曼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把霍夫曼和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相比较：“不过，说实话，霍夫曼作为诗人要比诺瓦利斯重要得多。因为诺瓦利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飘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

着人间的现实。”^①茨威格笔下的奇人怪事何尝不是依附于人间的现实？《家庭女教师》、《恐惧》、《火烧火燎的秘密》这样的作品，不是正好反映了他所十分熟悉的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生活吗？读了《看不见的收藏》，我们惊讶他对收藏家的心情感同身受；读了《象棋的故事》，我们又会赞叹他对象棋和棋手了解之深，殊不知这一切也是以他的切身经验为基础的。茨威格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专门收藏名家的手稿，例如歌德青年时代的著名诗篇《五月之歌》的手稿，便是他珍藏的无价之宝。而这位因读书而忽视体育的作家最喜爱的体育活动乃是下棋。

因此，尽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坛上各种流派争奇斗艳，茨威格却始终牢牢地把握住现实。他乐于表现在人生的搏斗中惨遭失败者精神上上和心灵上的升华。《马来狂人》中的医生本是一个被社会唾弃沦落到远东丛林里去的人渣。可是最后，他为了维护一个女人的名誉，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是一曲凄婉动人的赞歌，歌颂至死不渝的坚贞爱情。在人欲横流、爱情堕落成商品、婚姻变质为交易的年代，一个少女能爱得这样忘我，这样无私，这样纯洁，使人读后就像在令人窒息的秽气中嗅到一股清香，在满地污泥中瞥见一朵白莲。这是对人的赞美，对美德的歌颂。读者事后掩卷沉思，是谁造成了他们不幸的命运？时代和社会本来就是畸形的，把正常人压成了畸形。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刻画这些畸零人，岂不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继诗集《银弦集》（1901）之后，茨威格又于一九〇四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埃丽卡·埃瓦尔德的恋爱》，接着，他的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于一九〇六年问世。一九〇七年，茨威格二十六岁时，柏林王家剧院和维也纳宫廷剧院几乎同时要求上演他的第一部剧作，古典诗剧《特西特斯》（后因两家剧院的主要演员都猝然去世，未能上演）。正是这一年，享有盛誉的莱比锡海岛出版社（该出版社专门出版第一流作家的作品）准备出版他的作品。这两件事对这位青年作家来说，等于表明社会的承认和公众的赞赏。鉴于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诗集也由海岛出版社出版，茨威格后来写道：“由于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该社提出的惟一有效的标准便是最高标准，我二十六岁上就获得了‘海岛’的长年公民权，可以想像，我是多么高兴，多么自豪。”他不无得意地说：“现在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不过茨威格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忘乎所以，他为人谦虚谨慎，不重名利，平生最怕头衔、名望，总是避之惟恐不及。面对荣誉，他更加兢

兢业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身份（指“海岛”公民的身分——引者注）对外意味着文学上级别的提高，同时对内也加强了责任感。谁一进入这批文学精英的圈子，必须严于律己，谨慎行事，不得让人指责为文学创作马虎，新闻报道轻率。”他对二十六岁以前的作品，是采取冷静客观、极端严格的自我批评态度的。“我几乎相当早就开始发表作品，可是内心深处却坚信，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作品。”他认为自己早期的抒情诗尽管语言清新、音韵优美，可是缺乏生活，缺少新意，好些早期诗歌后来都没有收进集子。以名家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他总感到才力不济。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写中短篇小说，一九一一年发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一九二二年发表另一部小说集《马来狂人》，一九二七年发表小说集《感情的混乱》。直到一九三八年，差不多在登上文坛三十年后，才发表他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又译《爱与同情》）。

我们不妨把茨威格十六岁到二十六岁这十年看做他的练笔阶段。从一九〇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创作趋于成熟。他的剧本《海滨之屋》于一九一二年汉堡上演。他的喜剧《化身戏子》在一九一三年发表。他的各项写作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他的思想境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感到作家作为民众的良心，有责任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悲哀，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有责任登高一呼、振聋发聩。他后来回忆当时作家在道义上起的巨大作用：“对于诗人、作家来说，在那个人的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无线电絮聒不休的声浪所淹没的时代，并不是没有说话的希望。相反，一个大诗人自发的宣言所起的作用，比政治家所有的公开演说合在一起要强千百倍。”“话语在当时还有威力，它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宣传’滥用得声名狼藉，人们还听信这些写出来的话语，他们等着倾听这些话语……罗兰的一篇八页长的文章《超乎混战之上》，巴比塞的一本长篇小说《火线》，都能成为一件大事。”茨威格自己的剧本《耶利米》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正因为他意识到作家的职责，文学的作用，他开始写传记《三大师》。在彼此仇杀的年代里，写文章赞美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也夫斯基这三个所谓敌对国家的杰出作家，其政治目的不判自明。他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笔，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尽自己作家的本分。于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二十年内，他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数量惊人，质量优异。除了前面提到的小说之

外，还写了剧本《沃尔波纳》(1926)，《一生的传说》(1919)，《穷人的羔羊》(1931)，传记《三大师》(1919)，《与妖魔搏斗》(1925)，《三位描述自我的诗人》(1928)，《玛丽·安多纳德》(1932)，《玛利亚·斯图亚特》(1935)。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迎来全面的丰收季节。茨威格后来这样回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且好心好意地在我家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企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在《耶利米》之后，《三大师》为他开了路。当时各种流派，什么表现主义、实验主义等等都已衰微。“对于那些耐心的人，顽强的人，通向人民的道路又畅通无阻。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命运的转折点》——所有的学校都念这本书——收在《海岛丛书》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量便高达二十五万册。”“我发表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便出售两万册，报上还没有登出任何广告呢。”他的书被拍成电影，译成各种文字，畅销全球，发行量达几百万册，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获得这样巨大成功的人还不多见。

读者会问，他的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突然给他带来似乎意料之外、实乃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茨威格的解释是：

“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个人的怪毛病，也就是：我作为读者缺乏耐心，脾气急躁。一部长篇小说、传记，或者一篇论争文章里，任何离题万里、繁复堆砌、夸张过分的文字，任何含糊不清、多余饶舌、徒使情节延宕的段落，都叫我生气。只有一页页读过去，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气呵成，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才给我以充分的享受。落到我手里的书，十之八九，我觉得都因为充满了画蛇添足的描写，喋喋不休的对话，毫无必要的次要人物而失之庞杂，因而不夠紧凑，不够生动活泼。甚至最著名的古典杰作里面，也有许多枯燥、拖沓的段落，我读起来很不舒服。”

“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势必在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傲，教育自己要特别警惕。”茨威格写作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任笔驰骋，下笔千言，心里想写什么，全都诉诸笔端。可是写完之后，许多细节又全被删除。

“因为等形成雏形的第一稿一誊清，我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这就是浓缩凝练、巧妙布局的过程。这项工作我可以一做再做，无休无止。不断

扬弃糟粕，不断使内部结构紧凑澄净。把知道的东西隐而不吐，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一字一行，只要是得意之笔，他们对此都怀有某种偏爱，总想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博大精深，而我的雄心壮志却在于总使自己知道的东西远比流露在外的要多。这个提炼的过程，从而也是戏剧化的过程，便在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变成一种充满乐趣的猎逐，再去找出可有可无的一句或者一字，去掉它们非但无损表达的精确，同时还能加快速度。我的工作中，我觉得最愉快的其实是删繁去冗。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满意地干完活从桌旁站起，我的妻子说我今天似乎成功地完成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工作，我便得意地告诉她：‘不错，我又成功地删去了整整一段，从而使情节的过渡更加迅速。’所以有时候人家称赞我的节奏迅急、激动人心，这种特点绝不是来自我天然的热情或内心的激动，而完全是由于那种按部就班的方法，不断把可有可无的间歇和杂音全都删除。如果说我深谙什么绝技，那么这个绝技就是善于割爱。即使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进了字纸篓，只有两百页作为筛选后的精华留下，我也绝不抱怨。”

这段自述是了解茨威格成功的钥匙，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的文坛新秀也一定会有所裨益。

这样一个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家，在法西斯上台后，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出身不好”，他的书和海涅的书一样，竟在德国公开被焚。破坏人类文化的法西斯匪徒剥夺了茨威格写作的权利，实际上也夺去了他生存的权利。

大师之死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突然传出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的消息。近四十年来，德国文学的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愁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希特勒上台前，茨威格便看出法西斯包藏祸心，绝非善类。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分子上台不久，便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企图向全世界证明，国际共产主义，也就是世界犹太主义，阴谋颠覆德国政府，是德国人民的死敌。可是法西斯弄巧成拙，明眼人全都看清了这次大火的秘密。柏林当时正在

上演茨威格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火烧火燎的秘密》。人们站在广告牌前，相视而笑，心照不宣。这微笑激怒了做贼心虚的法西斯匪徒。这些真正的纵火犯终于撕掉了广告，电影被禁止上映。接着，柏林狂热的纳粹大学生在广场上焚烧进步作家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以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对元首的忠诚。包括海涅、托马斯·曼和茨威格的作品在内的大批书籍被焚，这些作家的作品统统被禁。大批进步人士，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作家受到迫害，关进集中营，或被迫流亡国外，德国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过深刻分析的茨威格，根据《我的奋斗》^①和法西斯上台前后希特勒的言行，对此人也进行了分析，希特勒青年时代作为一个落魄的艺术家，流落在维也纳街头，衣食无着、走投无路，为此他绝不会宽恕维也纳，放过奥地利。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一定要以胜利者的姿态，随着凯旋的行列，进入维也纳，看到这座曾经使他蒙受耻辱的城市匍匐在他的脚下。因此，当大部分欧洲人士，包括张伯伦这样老练的政治家在内，都对希特勒抱着幻想、以为绥靖政策可使法西斯展足的时候，茨威格却看清了法西斯的罪恶本质。一九三四年他被抄家，这是奥国当局所采取的一次难以自圆其说的行动。于是茨威格离开萨尔茨堡前往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并吞。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〇年，除了两度访问美洲之外，茨威格一直侨居英国。一九四〇年取得英国国籍，前往美洲，最后住在巴西。在这期间，他集中力量写作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并且创作了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茨威格在物质方面没有任何匮乏，而且也绝不缺乏荣誉。他在美洲的演讲旅行，总是一次次凯旋的进军，他在巴西举行作品朗诵会，总是万人空巷，深受欢迎。他有英国国籍，不像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处处受到歧视，在饥饿线上挣扎；他拥有巴西的长年签证，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共和国的贵宾。那么，他为什么自杀？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自杀当天写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须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

① “百日”，指拿破仑一八一四年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重登皇位，直至滑铁卢兵败的这段时间。

斯台芬·茨威格

1881-1942

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在自杀之前写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份更详细的绝命书。他在回顾一生时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过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便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这个武器的效用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却急不可待，失去耐心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令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们遭到的厄运，但他去国离家，成为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同样备受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肉体的疲劳，而是心灵的疲惫。就像他在《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①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自相残杀的野兽，使他理想破灭，万念俱灰。在他自杀前几天，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进一步感到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他相信人们总有一天可以看到“旭日东升”，但这需要等待，需要经过长期的善与恶的搏斗，而这场搏斗中他只能等待，只能忍受，这是他

所不能接受的。这种等待便是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亡乃是返回故里。他不是战士，他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能指望他战斗到最后的一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作家，他曾为别人的苦难，笔尖蘸满了同情，写下了一篇篇催人落泪、动人心弦的作品，让我们也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为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的殒落而谴责那罪恶的法西斯主义。

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大师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民众，不久前曾踊跃参加这位作家的朗诵会，这时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在灵车后面为他送葬。巴西政府决定把茨威格生前最后几天住过的那幢坐落在彼特罗波利斯的别墅买下来，作为博物馆供人参观。

法西斯上台前，茨威格的创作如日中天，在德国作家中拥有读者之众，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的作品雅俗共赏，销售量直线上升，他思想深邃而不流于晦涩、文字平易而不流于肤浅，情节动人而无斧凿的痕迹。他没有德国作家故弄玄虚的通病，没有玩深沉的“哲学思考”，也没有为卖弄渊博而故意生造出来的古怪词句。茨威格这种纯正真切平易近人的风格，是他赢得读者的主要原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茨威格既是个杰出的艺术家，又是个能给人以慰藉、启迪的朋友。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却长期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所忽略。

一九三三年以前，反映迟钝的文学评论家还来不及对他的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九三三年茨威格的作品被焚遭禁，从此这位犹太作家几乎从德国学者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一九四五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和日本，接着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惟独在德语国家似乎为人所遗忘。

直到一九八一年，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乱》，他的作家传记《三大师》、《与妖魔搏斗》，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东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先后出版，并且一再重版。读者似乎发现了一颗文坛新星，从此茨威格名声大振，不仅他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于是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以及其他第一次问世的中短篇。从一九八